

# 福建省国际移民的移民网络探析

## ——兼评移民网络理论

郭玉聪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移民网络理论”在国内外日益引起重视。其理论假设之一是移民网络具有积累性效应。但福建移民网络在移民潮掀起时迅猛增长的态势,与该假设的根据迥然不同。其假设之二是移民网络是移民长盛不衰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原因。但福建新移民的事实说明,移民网络不能长盛不衰,福建移民网络正在减速,且有停滞的迹象。因为其迁移方式是家族式迁移,网络的伦理结构是“差序格局”。

**关键词:** 福建新移民; 移民网络; 移民网络理论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2009)06-0113-08

产生于国际移民大潮中的“移民网络理论”(Network Migration), 20 年来在国际移民研究领域日益引起重视, 间或有人质疑其中的某些观点; 在我国则被大量应用, 鲜少有人提出质疑。本文以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及相关统计资料为基础, 从内在机制上探析福建移民网络的动态特征及其原因等, 希望对移民网络有新的发现, 同时对该理论的两个主要理论假设进行验证。

### 一、关于“移民网络理论”

1975 年全球国际移民人数已有 8400 万, 2000 年迅速增加至 1.75 亿, 2006 年大增至 1.95 亿人。<sup>①</sup>面对着移民大潮, 欧美学者们群起研究, 主要关注移民的产生和延续规律, 陆续提出“移民网络理论”等多种移民理论。而在“当代国际移民研究中, 最有这个时代特点的莫过于移民网络说”, “对移民的考察和解释以移民网络为纲, 这是如今的新颖之处”。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露藤斯大学移民与公民身份研究中心主任华金·阿朗戈(Joaquin Arango)教授如是说(阿朗戈, 2001)。

\* 收稿日期: 2009-09-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南亚华族与其他移民族群国家认同、族别认同的比较研究”(08BMZ032); 教育部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新移民、东南亚华人再移民及其对亚太国际关系的影响”(07JJDGJW258)

作者简介: 郭玉聪, 男, 福建泉州人,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暨南洋研究院教授。

① 国际移民组织(IOM)驻华联络处执行主任 Kieran Best 2008 年 9 月 28 日提供的数字。

移民网络理论或“网络说”是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道格拉斯·梅西(Douglas S. Massey)等人1987年在“社会资本”理论和“累积因果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厄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各种资源的集合体,其本质是人际关系网络。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米尔达(Gunnar Myrdal)提出的“累积因果关系”认为,移民行为有其内在的自身延续性,即使最初导致移民的客观环境发生变化,移民行为仍将持续(Emma Herman, 2006: 198-201)。对二者进行补充,用之于发展移民网络理论的,正是梅西及其合作者。所以这些理论的许多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梅西、米尔达和阿朗戈都认为:移民网络是先行移民与故乡的后来者之间各种纽带关系的组合,其纽带可以是血缘、乡缘、情缘等。移民网络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援,如助人钱财、代谋差事、提供住宿等。每次迁移都成为后来者的资源,都在为以后的迁移牵线搭桥。而新的迁移又导致了网络的扩大和进一步的发展,从而推动跨国移民不断扩大规模(Douglas, 1998: 17-59; 阿朗戈, 2001; 李明欢, 2000)。其理论假设之一是:移民网络具有积累性效应,而且是“鼓励后来移民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Emma Herman, 2006: 198)。学者们还进而引申出第二个假设:移民网络是移民长盛不衰的最重要,甚至唯一的原因或机制。梅西和布厄迪厄均一再强调:社会网络对移民的重要性如何估计都不过分,这是移民发生并能够长盛不衰的最重要原因和内在机制。梅西组织的“南—北移民委员会”经过四年的研究后确认:移民网络一旦建成,“就会使人口的国际迁移获得自主性的动力,在引发移民的初始原因消失后,仍然得以长期延续。”(Douglas, 1998: 289)另一方面,在迁移原因的横向比较上,梅西等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向国外特定地区定向移民不再与经济、政治条件直接相关,而更多地是由与移民网络的联系程度以及在移民网络中积累的社会资本等因素来决定。”(Douglas, 1997: 17)值得注意的是,阿朗戈虽然也有类似的论述,但是,对于将移民网络的作用提高到无与伦比程度的说法,他却语带保留:“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移民雪球不会永远滚下去,其饱和点会在某个时候到来,然后就会减速。移民网络的增长和停滞应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领域。”(阿朗戈, 2001)这是一个颇有意义的命题,尽管他语焉不详。

福建移民潮兴起已有20余年;福建新移民已经达到200万人<sup>①</sup>,约占中国大陆新移民总数的29%,分布在167个国家。我们2002年至今已对福建新移民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调查<sup>②</sup>,并参与福建省对新移民的多次调查统计。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深入探析移民网络,评析移民网络理论。

## 二、福建国际移民网络的形成与发展

移民网络理论的第一个假设虽然能演绎出可观察事实,但与福建移民网络的事实迥然不同,第二个假设则难以演绎出可观察事实。移民能否构成网络,移民网络是否有积累性效应,首先取决于先行移民的牵引数量。

### (一) 福建赴美先行移民的牵引作用

移民网络理论的基础是在欧美对移民群体的调查,被反复引用的是关于先行移民牵引后来者数量的调查。弗雷德·阿诺尔德(Fred Arnold)等曾调查美国的菲律宾和韩国移民,测算的结果是:平均每个菲律宾人家庭、韩国人家庭分别带入一个家庭成员和0.5个家庭成员(Arnold Fred, 1989:

① 该数字是笔者在与福建省政府侨务办公室、福州市侨联合作调研中根据各地的统计数字估算的。

② 8年来庄国土教授和笔者等对福建新移民及其家庭和社区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共14个表格、242种数据或问题,涵盖移民网络的基本情况。共获得有效问卷3900余份,深度访谈笔录600余份。阶段性成果2005年获福建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这是规模最大的关于新移民的问卷调查。本文未注明出处的数据等,皆来自该调查。

813)。格勒米那·贾瑟(guillemina jasso) 和马克·罗森茨维格(mark rosenzweig) 认为: 每个移民迁移十年后平均带入 1.2 个“劳工类”移民(Jasso, Guillemina, 1986: 291)。他们的特定条件是劳工类移民, 这应该是正确的, 因为此类移民的迁移不受学历、资本、技术等限制。福建新移民中劳工类移民约占 90%, 以之为例探讨移民网络最为合适。在大多数移入国, 福建新移民在兴起移民潮的 20 年前后, 可带入的后来者数量远远多于上述测算, 此后却大不如前。上述测算对象是在美国的移民, 本文也首先以福州赴美新移民为例。我们特别关注移民网络的起因也是在美国的调查。

在 2004 年 12 月 8 日费城的一次宴会上, 费城福建同乡会会长卢代仁和 17 位闽江口长乐、连江、马尾地区新移民谈起美国福州人大增的现象, 大家纷纷说是一带百, 百带千。接着逐个统计, 结果 18 人每人都带了 100– 200 余人不等。8 年来笔者等在纽约、费城、华盛顿, 以及闽江口地区分别就该问题访问了近 300 位新移民。其中有 241 位提供了牵引后来者的具体数字。先行者不同的移民年限和身份<sup>①</sup> 牵引的后来者数量各不相同, 241 位先行者每人平均直接牵引的人数分别是: 迁移 25 年以上者 48 人, 每人牵引 93 人(其中侨团干部 20 人, 每人牵引 108 人); 迁移 20– 24 年者 67 人, 每人牵引 71 人(干部 19 人, 每人牵引 87 人)。合计移民 20 年以上者, 每人牵引大约 80 人(庄国土, 2006)。迁移 15– 19 年者 55 人, 每人牵引 26 人(干部 11 人, 每人牵引 40 人)。迁移 10– 14 年者 46 人, 每人牵引 0.9 人(干部 5 人, 每人牵引 1.2 人); 迁移 5– 9 年者 24 人, 每人牵引 0.2 人(干部 1 人, 牵引 1 人)。早年的移民大量牵引亲人, 此后牵引人数一路大幅度减少, 近十年左右每人平均直接牵引人数甚至少于 1.2 个, 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

上述访谈毕竟数量有限, 福建人大量牵引亲人出国是否确实是普遍现象? 近来牵引人数是否大量减少? 能否推及其他? 我们还应当从新移民整体的增长态势上进行分析; 不仅分析福州赴美新移民, 也兼及福建境内的温州人等其他新移民。

(二) 福建新移民的增长态势

从 1949 年至 1982 年, 福建的国际移民累计仅 3997 人。1983 年以后的增长态势是: 1990 年达到 32 500 人, 8 年增长大约 8 倍。1990 年前后掀起移民潮, 1996 年达到 533 500 人, 6 年增长 17 倍。2005 年达到 150 万人, 9 年增长近 3 倍。2009 年达到 200 万人, 3 年半增长近 0.3 倍。

表 1 相关国家福建新移民增长态势 单位: 人

|              | 美国         | 阿根廷        | 南非         | 俄罗斯        | 意大利        | 日本         |
|--------------|------------|------------|------------|------------|------------|------------|
| 移民开始到掀起高潮年份  | 1983– 1990 | 1993– 1996 | 1994– 2001 | 1992– 1997 | 1989– 1999 | 1974– 1989 |
| 1996 年 6 月人数 | 425 271    | 72 13      | 510        | 2810       | 4311       | 77 100     |
| 2005 年 6 月人数 | 707 635    | 50 579     | 10 290     | 6129       | 26 479     | 49 995     |
| 2009 年 6 月人数 | 800 000    | 66 000     | 65 300     | 7450       | 32 000     | 34 500     |

注: 以上数字主要根据当年的福建省侨情普查结果。但笔者在与福建省侨务办公室一年的合作调研中, 发现各县市相关数字遗漏不少, 因而进行补漏, 2009 年福建省赴美新移民(主要是福州人) 数字等就是补漏后的数字。

换一种算法, 可以估算全省先行移民牵引后来者数量为: 1982 年的 3997 人, 从 1983 年开始到 1996 年的 13 年内, 直接或间接牵引 529 500 人(当年的移民数量扣除先前的移民数量, 下同), 平均

① 按比例被访者中侨团干部较多。虽然福州赴美新移民侨团干部多达万余人, 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较高, 所以在对移民年限进行划分的同时, 辅以身体的划分, 这应不失为对新移民进行粗略分层的一种方式。

每人直接或间接牵引(牵引率)132人。间接牵引即先行移民牵引的移民再牵引后来者。13年内可以再间接牵引,更说明不只是10年后才牵引1.2人。1996年的533500人,至2009年6月的13年内,直接或间接牵引大约1466500人,牵引率2.7人。整体态势如此,但福建新移民有很多增长点,且是较有代表性的增长点。详见表1。

在1949年以前,移民美国的福州人约有几百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约有3000人从闽江口赴香港、新加坡当国际海员,船抵岸后滞留美国,然后申请合法身份(庄国土,2003)。至1982年二者合计最多4000人。从1983年到1996年增至425271人,13年内增长106倍,牵引率106人;到2009年6月大约增至80万人,13年内增长不足一倍,牵引率不足一人。

长乐市猴屿村是迁移美国的发源地之一。该村在1945年前后有7个人迁移美国。20世纪50年代初有400余人到香港当海员,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这400余人依靠在美国7位亲人跳船居留美国。1990年代该村有近4000人口,迁移美国的每年激增至100-200人。至1996年该村就有1600余人迁移美国,还有300余人迁移其他国家或地区。2001年前者增至2400余人,后者增至400余人。到2009年前者增至2500余人,后者增至500余人。村里仅存少量妇女、儿童和老人。近13年牵引率只有0.5人,而且迁移率越来越低,近9年的赴美人数还不如15年前的一年。

从表1可见,福建赴阿根廷、俄罗斯、意大利的其他移民网络虽然出现较迟,也出现起初大幅度增长,十几年后就明显减速的现象。因为移民潮出现较迟,南非的移民网络2005年仍在大幅度增长,但最近已有减速迹象。过去从来没有国际移民的内陆山区也是如此。闽西明溪县沙溪乡、闽北建阳市黄坑镇、安徽歙县槐塘村因为温州人移民的牵引而出现大量新移民。以这三个地方为例,不仅可以从源头上了解其准确的增长态势和先行移民的牵引人数,还能推及其他。阿朗戈质疑一些移民理论,就因为其论述不能推及其他。

沙溪乡沙溪村青年胡志明原籍温州文成,1989年他在文成亲人的牵引下移民意大利。1990年他刚刚站稳脚跟,就牵引沙溪村的16位兄弟及堂亲和邻村梓口坊村的一位堂亲去意大利。第三、四年牵引的后来者扩展至邻近的4个村,同时迅速向本乡和邻乡扩展。牵引人数为:1992年,本乡53人;1997年,本乡570人,本县2958人;2002年,本乡1385人,本县6150人;2009年6月,本乡2263人,占本乡人口的37%,本县11200人,占本县人口的9.7%。从1989年到2002年的13年内,一个人竟然直接和间接牵引了6150人。即使从第3年的1992年起算,十年内增长率也达到1200%。但是,近7年增长率仅为90%,十年后牵引率很难说会达到1.2人,颓势明显。

黄坑镇人口5860人,辖下苦竹坪村人口525人。该村的朱良楚是温州瑞安人,其弟弟仍在瑞安老家,1985年他在其弟的牵引下移民意大利,4年内就将堂亲、表亲、姻亲和瑞安同乡39人牵引到意大利。至2009年,苦竹坪村共有253人移居意大利等国家,大部分青壮年均已移民。新历村民林朱庆,也是温州人,当年与朱良楚同行,如今也牵引了该村240多人去意大利。在2000年前后,另外七个村的与之有姻亲、表亲关系的村民也陆续被牵引出国,至2009年6月共有705人。同时扩展至周边的镇和街道,全市移民总数2004年达到1007人,2009年6月达到1389人。从1985年到1989年的4年内,两个人直接牵引了74人,增长37倍;1989年至2004年的15年间,又直接或间接牵引了933人,增长近12.5倍。但近5年仅增长38%,较之沙溪增长率降低更多。

槐塘村人口1250人,其中1949年前后迁来的温州人近600人。1974年,14岁的温州人郑朝荣过继给在意大利的伯父。1980年前后,他将大哥、五弟、六弟及其妻子,以及9个侄子女计15人全部带出国。1980年前后还有本村的温州人胡克毓和王永千由温州亲戚牵引去欧洲。此后郑、胡、王三人牵引的亲人,至2000年达到370人,至2009年达到500人左右,其中温州人就有400余人,约占全部温州人的85%。从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内,3人就牵引了370人,增长120多倍,但从2000年至今的9年间,仅增长40%左右,增长率比黄坑更低,牵引率可能低于1.2人。

从福建新移民的增长态势看: 早年的先行移民大量牵引后来者很可能就是普遍现象, 一带百是可能的, 百也可能再带千, 而且十年以内就可能大量牵引后来者, 不只是“十年后才牵引 1.2 个后来者”; 最近 13 年再牵引人数可能连 1.2 个都达不到, 移民网络可能已经减速, 从表 1 还可见日本的移民网络已经停滞。福建新移民的牵引率之所以高于上述移民群体, 是因为福建近几年还有许多新的移民增长点。这两种可能性是否确实无疑, 我们再看看后来者是否就是先行移民牵引出国的。

(三) 福建新移民在国外的亲人关系网及家族式迁移方式

梅西考察想移民到美国的墨西哥人后发现: 那些与海外移民有着某种社会关系的人会极大地增加国际迁移的可能性; 在某些发达国家中, 特定移民族群的存在极大地增加了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迁入的可能性( Douglas, 1998: 275– 294)。可惜这种结论较笼统, 移民网络理论根据的还是波特斯等人的调查。波特斯等对 1973– 1974 年进入美国德克萨斯港口的 822 名成年墨西哥移民的调查表明, 其中大约有 90% 是通过其在美国的亲人或者与其有联系的雇主而获得居住许可的; 有 70% 曾作为非法移民在北美生活过(A. Portes, 1955)。但是, 在福建省侨办 2009 年 5 月召开的关于新移民的座谈会上, 侨务干部们有不同看法, 均认为新移民的迁移方式, 就是家族式迁移。福清新厝镇王副书记甚至说: “99% 的新移民是先行移民带出去的。”这种现象显而易见。我们也以美国为例考察新移民的亲人关系网( 详见表 2)。

表 2 被访赴美新移民家庭在美亲人关系表 单位: 人

| 与户主的关系    | 伯、伯、婶、伯母、<br>姑姨、舅、妯、姑丈、姨丈 | 堂兄弟姐妹<br>表兄弟姐妹 | 侄子女、<br>甥、甥女 | 嫂、弟媳、<br>姐夫妹夫 | 女婿、儿媳 | 公、婆<br>岳父母 | 合计     |
|-----------|---------------------------|----------------|--------------|---------------|-------|------------|--------|
| 长乐 1233 户 | 1. 66                     | 4. 79          | 4. 13        | 1. 13         | 0. 72 | 0. 10      | 12. 53 |
| 连江 307 户  | 2. 03                     | 4. 73          | 6. 11        | 1. 56         | 1. 30 | 0. 91      | 16. 64 |
| 马尾 565 户  | 3. 83                     | 6. 36          | 4. 73        | 1. 68         | 1. 18 | 0. 30      | 18. 08 |

从表 2 和其他新移民特点可以看出, 后来者大多是先行移民牵引出国的。详叙如下:

1. 福建新移民家族式迁移的特点明显, 先行移民愿意提供帮助。我们 2002 年 10 月就开始陆续开展调查, 时至今日, 其实际的亲人数量比表 2 中的 12– 18 个更多。在美国有这么多亲人, 其家族式迁移特点相当明显。家族式迁移说明新移民大量牵引后来者的情况并不是特例, 而是常态。国外亲人也都认为帮助后来者责无旁贷。美东福建同乡会会长陈清泉、美国长乐公会会长石水妹和卢代仁等在同我们的交流中, 都发表了经过长年观察的看法。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对于先行移民来说, 五服之内的都一定要帮忙, 自家兄弟姐妹和亲戚更要帮忙。

2. 新移民在国外没有别的重要关系。我们的调查结果与波特斯等人的调查差别较大的有: 新移民在美国有众多亲人, 却鲜有雇主。差别最大的是: 曾作为非法移民在美国生活过的福建新移民不足 1%。福建赴美新移民也多为非法移民, 但他们除非被捕遣送回国, 否则无论如何也不肯再来一次, 因为其出国费用十几倍于墨西哥移民, 已经达到七万美元左右, 他们绝不愿意让该费用打水漂。他们既未曾作为非法移民在美国生活过, 就“没有与其有联系的雇主”。

3. 后来者的迁移亟需帮助。福建劳工移民文化程度低, 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 80% 左右; 他们本来就相当贫困, 极其昂贵的出国费用使他们都负担巨额债务。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岂止“获得在美国的居住许可”, 他们出国前后均需要国外亲人的全程照顾。

凡此种种, 说明牵引后来者的主要是亲人或家族。从移民网络的内在机制上看, 家族式迁移是移民网络增长、减速、停滞的最重要原因, 学者们对此却着墨甚少。关于家族式移民, 如果我们审视全省的移民态势, 再推及其他, 就更清晰可见。

80 万赴美新移民主要分布于闽江口, 毗邻闽江口的福清市新移民虽然多达 40 余万, 但赴美新移民仅 11 634 人; 福清市江阴镇主要迁移南非、俄罗斯, 晋江市主要迁移菲律宾。但是, 在中间的莆田市涵江区, 尽管新移民多达 30 万人, 赴南非、俄罗斯、菲律宾的移民不足百人。如此等等, 地域特点相当明显。植根在地域上面的是家族, 正所谓地缘是“血缘的空间投影”。在福建侨乡, 一般都是聚族而居, 我们抽样调查过的 100 多个村庄, 绝大多数是一村一个大姓, 如猴屿村 95% 都姓郑。有的一村多个大姓, 移民群体也按家族、宗族划分。

福清市江阴镇人口 73 750 人,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有新移民 24 904 人迁往 36 个国家。近 15 年来, 主要移入国家南非、阿根廷、俄罗斯, 分别达到 4518 人、1904 人、2142 人。只有一个大姓的村, 移民主要集中在一个国家, 如莆头村新移民 582 人, 其中迁移南非 390 人。有几个大姓的村, 按姓氏各有主要移民国家。例如, 东井村有郑、庄、翁三大姓, 新移民总数 566 人, 郑姓主要迁移南非, 215 人; 庄姓主要迁移阿根廷, 85 人; 翁姓主要迁移俄罗斯, 145 人。田头村有严、张、林三大姓, 新移民总数 797 人, 严姓主要迁移阿根廷, 313 人; 张姓主要迁移南非, 95 人; 林姓主要迁移俄罗斯, 202 人。同村异姓通婚者, 婆家和娘家移民国家各不相同。田头村新移民严祥妹的丈夫 1997 年迁移俄罗斯后, 把她和整个家族 100 多人都带去。她姐姐婆家整个家族也迁移俄罗斯。但她 4 个哥哥都在阿根廷。她三哥严云祥是阿根廷福清同乡会会长, 他对笔者说, 他和另一位侨领直接或间接带到阿根廷的多达 500 人, 严氏家族几乎全部随迁。而在田头村, 他家与姐妹的婆家相隔不过百米。

家族式移民的基本特征是: 先行移民要牵引的首先是兄弟姐妹、家庭成员、堂亲; 然后就是表亲、姻亲。后者与前者虽然有较大差别, 毕竟也是近亲, 母族、妻族也可以与父族并列为九族。但是, 余者即便是一般的沾亲带故者, 也难以被牵引。我们再比较三个各不相同的温州人移民网络。

沙溪乡沙溪村胡志明的父亲 20 世纪 50 年代从温州迁来, 其母当时已是 3 个儿子的母亲, 其父母婚后又生下胡志明和一个弟弟。特殊的家庭, 加之在沙溪土生土长, 与沙溪颇有感情, 他也可以说就是沙溪人。因为 3 位同父异母哥哥的关系, 堂兄弟姐妹们为数众多, 堂亲主要在沙溪。所以他翌年就牵引兄弟及堂亲们, 然后扩展到族亲, 并且由众多族亲再扩展到其他乡村乃至其他乡镇、其他县区的表亲、姻亲等。因为族亲的基数大, 强关系多, 20 年内就发展为一个庞大的网络。

黄坑镇村民多由福建莆田、浙江温州以及其他省迁来, 1967 年前后迁来的温州人就有 1700 人。苦竹坪村以莆田人和温州人为主, 因为村民多为各地移民, 所以姓氏多达 20 余个。朱良楚出生在温州瑞安, 出国后首先牵引的是本村的族亲, 但因族亲人数有限, 而温州人与其他人互相通婚现象普遍, 所以在牵引族亲后很快就牵引本村的表亲、姻亲, 以及邻村邻镇的表亲、姻亲和瑞安同乡。该镇另两个村与温州人没亲戚关系, 至今无人被牵引出国。先行者族亲少, 强关系少基数就小, 姻亲、表亲等弱关系相应也少。只是因为同时出现了新历村等增长点, 所以其移民网络不算太小。

槐塘村的温州人不足 600 人, 而且高度集中在槐塘村 6 个较小的生产队, 人口占其中的 90% 以上。该村现在的 500 位移民, 也都集中在这里。原因是: 温州人族亲较少, 姓氏各异, 异姓通婚也主要局限于温州人之间。本村另两个最大的生产队, 绝大多数为本地人, 只有几个人是温州人的亲戚, 所以至今只有十几人移民。正因为温州人数量很少, 连对外扩展的弱关系也少, 所以尽管移民最早, 先行者也较多, 这里的移民网络却最小, 而且近几年几乎没有增长。

家族式迁移说明, 后来者确实就是先行移民牵引出国的, 即使不是 99%, 也基本上是被牵引出去的。但是, 家族成员大多已在国外, 现在就很少有人可以再牵引了。正因为家族式迁移, 导致后来移民数量的剧减, 导致移民网络的减速或停滞。家族式移民是移民网络最重要的内在机制。

综上所述应可以认为: 1. 移民网络一旦建成, 十年以内就掀起牵引后来者的高潮, 高潮持续时间可达 20 年左右, 阿朗戈所设想的饱和点就在这个时候到来。2. 先行移民大量牵引后来者确实是普遍现象。3. “新的迁移又导致了网络的扩大和进一步的发展”现象虽然存在, 但是, 与早期的迁移

比较大相径庭,其扩大和进一步发展力度都将迅速衰减,移民网络不会长盛不衰。网络的模型就像“U”形,也酷像福建沿海的渔网,决不是移民链构成的平行线——贾瑟所描述的充其量只是“移民链”。不过,我们还应深究的是:为什么会有家族式迁移,中国的“家族”或“宗族”等有何特殊之处。

### 三、福建移民网络的伦理结构

布厄迪厄等学者认为,移民网络的基础是各种纽带关系间的信任、互惠(或互哺)和合作(王淮,2006)。在互惠等方面,我国的学者也举了一些实例,如先行者的企业需要劳工,后来者在其中努力工作等等。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是,先行者原是劳工移民,所办企业并不多,其企业所需劳工也有限,倘若后来者无法反哺,信任、合作关系也就不存在,先行者还愿意牵引后来者吗?学者们对这种关系也心生疑窦,以致要引入其他中介性组织。但是,阿朗戈看出了其矛盾之处:“布厄迪厄等名流的‘社会资本论’这个大框架就像一些学者认为的,可以容纳其他中介性的组织(如走私团伙以及慈善或人道主义团体)。这些中介性组织出于各种目的,都在帮助移民克服进入他国的各种困难。不过,要把这些组织归入由个人纽带组成的‘社会资本’,恐怕不像将移民网络归入‘社会资本’那样顺理成章。”(阿朗戈,2001)关键之处是若不借重中介性组织,西方人就无法解释牵引者的慷慨,更何况福建劳工移民的困难远远不止钱财、住宿,还有法律责任、生命危险,以及繁琐的签证等更大的困难。将“家族”或“宗族”等作为福建新移民最重要的“社会资本”,才是顺理成章的。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说:“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费正清,1990:15)扎根在中国的外国人则可能有所理解。美国记者詹姆斯·米勒就说:“儒家思想的前提是人是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亲属关系网所界定的。个人利益是与宗族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它可以前后延伸至好几代人”,“尊重前辈和后人的利益是儒学有关自我与前提思想的核心。儒家思想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我是谁?我是父母的孩子和孩子的父母’。”(米勒,2009)其实,还应该进而说“我是兄弟姐妹的兄弟姐妹,我是这个家族、宗族的人……”在我们所调查的福建侨乡,最明显的标志是祠堂,有的村大小祠堂多达44座,而且大多已由新移民捐资扩建翻新。侨乡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亲情之爱。中国人的爱心和诚信常常受人诟病,但在亲人之间,其仁爱之深,信用之昭著,所表现的人性之美,确实与众不同,欧美学者们殊难感同身受。

不过,在“家族”或“宗族”、亲人之外,就会受到明显的差别对待。梅西看重“移民网络的联系程度以及在移民网络中积累的社会资本”(Douglas,1997:17),但他未曾想到,先行者与移出地的联系程度是会不断减弱的,在移出地的人际关系是会大量减少的。移民原因的研究本应同时注重移入国与移出地,甚至应该更重视后者,可惜正如阿朗戈所说,学者们的研究只局限于移入国这一方(阿朗戈,2001)。

儒家伦理纲领的五伦关系演变至今,重视家庭、家族关系仍是中华文化的最大特色,被视为整个社会关系的根源。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结构是差序格局,即“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人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费孝通,1985:22-23)。形象地说,差序格局犹如以石击水后产生的同心圆涟漪,我是圆心,外面各个圆圈依次是家庭、家族、亲戚朋友、同乡等,越里面的圆圈关系越密切。“仁”是伦理关系中的共相,但儒家主张差等性仁爱。费孝通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不像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那样有一个适合所有人的普遍的道德标准,它的道德是个人化的,视其所施对象与己关系如何而加以伸缩。”(陈衍德,1998)福建新移民的人际关系正是其典型写照。这种伦理结构也是福建移民网络的独特之处。

本文主要从网络的内在机制上探讨移民网络。移民能否形成网络,能否长盛不衰,以及移民网络的增长、减速和停滞,还有机制外的原因。移民的初始原因如移出地的生存环境如何,以及移入

国的原因如移民政策、民族政策及其与中国的关系等,无一不是其重要原因。梅西等认为移民的“初始原因”和移入、移出国的“经济、政治条件”无关宏旨的观点显然欠妥( Douglas , 1998: 289; Emma Heman, 2006: 198– 201)。各侨乡附近的大城市为何没有移民潮? 福建省新移民的迁移国家多达 167 个,为何在大部分移入国甚至构不成移民网络? 就因为有这么些重要原因。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对于移民潮的形成来说,即便“移民网络的扩大属最重要的机制”(阿朗戈, 2001),也非唯一原因。

参考文献:

陈衍德, 1998:《网络·信用及其文化背景》,庄国土等编:《世纪之交的海外华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 1990:《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 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 1985:《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

华金·阿朗戈, 2001:《移民研究的评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 8 期。

李明欢, 2000:《20 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第 4 期。

王淮、钱江, 2006:《移民网络、社会资源配置与中国东北新移民》,《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 2 期。

庄国土, 2003:《从跳船者到东百老汇的主人——近 20 年来福州人移民美国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 3 期。

庄国土, 2006:《近 30 年来中国海外移民:以福州人移民为例》,《世界民族》第 3 期。

詹姆斯·米勒:《中国传统哲学有助可持续发展》,《参考消息》,2009 年 6 月 28 日。

A. Portes, 1955, *The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Immigration: Essays on Networks,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ed.) New York: Russell Sade Found.

Arnold, 1989: “Estimating the immigration multiplier: an analysis of recentorean and Filipino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3.

Douglas S. Massey, 1997: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 A Global Perspective*, Longman.

Douglas S. Massey et al, 1998 : *Worlds in Mo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Emma Heman, 2006: “Migration as a Family Business: The Role of Personal Networks in the Mobility Phas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44(4) .

Jasso, Guillermina, 1986: “Family reunification and the immigration multiplier: U. S. Immigration law, origin– country condition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immigrants,” *Demography*.

[ 责任编辑: 陈双燕]

Networks for International Emigration in Fujian Province and the Migration Network Theory

GUO Yurong

(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Migration network theory” has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One of its assumptions is that migration networks have the effect of cumulative causation, which contradicts the practice in Fujian Province. When emigration surges, migration networks are rapidly strengthened. Another assumption of this theory is that migration network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and perhaps the sole cause of sustained migration. However, the empirical evidence in Fujian Province shows that migration networks cannot be sustained on a long-term basis. The development of migration networks in Fujian Province has slowed down, and tended to stagnate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emigration in this province has been family based, and the structure of migration networks has followed 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à la Fei Hsiaotung”.

**Key words:** new migration in Fujian province, migration networks , migration network theory